

[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

卢幸妮译，史晓林校

用文化重建欧洲

[内容摘要]此文主要取自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教授 2013 年 1 月 28 日在香榭丽舍圆形剧院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名为“欧洲或混乱”的演讲。克里斯蒂娃教授论及身份认同、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话、对自由的不同理解，主张把欧洲文化当作重建欧洲的重要资产来对待，重视精神分析的作用，通过对欧洲文化进行重估，来分析当前欧洲意识中存在的危机，为欧洲在政治上的联盟做文化上的准备。

[关键词]欧洲文化；身份认同；多样性；理想病

欧洲乱作一团吗？有些人认为它是的。今天，我将断言，如果没有欧洲，混乱将重新当道。为了让你接受我的观点，我要强调欧洲文化的一些特定特征：对身份认同的质疑，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话，国家、自由、宗教、女性在世俗社会中的意义。在文章结尾，我会告诉你我在巴黎少年宫所开设的研讨会的情况。这个研讨会是为少年宫工作人员而设，他们陪伴着那些在激进边缘的年轻人成长。我将建议，我们应当把欧洲文化当作重建欧洲的重要资产来对待，通过对欧洲文化进行重估（用尼采的话说是，重估一切价值），来分析当前欧洲意识中存在的危机。

作为一名出生在保加利亚、被美国人收养、拥有法国国籍的欧洲公民，我对严厉的批评并非置若罔闻，然而在批评声中，我听到了一种构筑欧洲身份和文化的渴望。尽管面临着金融危机，但希腊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甚至法国人都并不怀疑他们归属于欧洲文化；他们“感受到”自身是欧洲人——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罗马条约都没有提及这一点——这种情绪意味着什么？它最近才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比如提议支持欧洲遗产，但这种文化管理缺乏前瞻性视野。我相信欧洲文化可能是引领欧洲国家进入欧洲联邦的主要道路。然而，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欧洲文化？^①

一、哪种身份？

与身份崇拜相反，欧洲文化从未停止过探讨这一悖论，即身份，包括我和我们的，确实存在，但它是无限地可构成的，同时也是不可构成的。

我在犹太人的上帝那里听到了这种态度：Eyeh asher eyeh（“我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记第 3 章，第 14 节），被耶稣使用（“我是”）（约翰福音第 4 章，第 26 节），他没有对身份认同下定义，而是将“我”送回其永恒回归的存在。在我与自己的思想对话中，我以一种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原籍保加利亚，1966 年移居法国，现为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其知识履历横越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等多个领域，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代思想宗师。

^①这篇文章主要取自作者在 2013 年 1 月 28 日在香榭丽舍圆形剧院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名为“欧洲或混乱”的演讲。

不同的方式理解它，根据柏拉图的观点，它总是“二位一体”的，而柏拉图的思想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将答案分解成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中，他通过呼吁个人记忆和个人传记，宣告一个社会空间和一个政治构想。在圣奥古斯汀的意义里，家园只有一个，那就是航行本身：在回家的路上。在蒙田《随笔集》中，他致力于复调的“我”的身份，他写道“我们都是硬块，各不相同，我们形成了这样的结构，每一部分在每一个时刻，都自娱自乐”。在笛卡尔的《我思》中，我们听到“我思故我在”这样的声音。但“思考”是什么呢？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我又听到了这句话，“我是一个永远自我否认的灵魂”；在弗洛伊德无休止的分析中：“它（身份）在哪里，自我就在哪里”（它我所在之处，自我也应到场）。

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欧洲最好的回答不是确信，而是对问号的热爱。在屈服于以身份为重点的教条之后，屈服于犯罪之后，一个欧洲的“我们”现在正在出现。虽然过去欧洲诉诸野蛮行为——这一直需要我们记忆和反省——事实上——我们已经——彻底地分析了它的行为，或许可以让它以一种质疑不安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一种对身份认同的理解和实践。

我们可以重新考虑把欧洲文化传统作为一个对抗手段，用来消弭你我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紧张。我们无需列举此类身份质疑的所有来源，我们只需要记住这种持续审问会变得对社会有害或自我敌视，欧洲远未幸免的一种自我毁灭。另一方面，我们经常把这种身份的遗产降低到对他人宽容的程度。但宽容只是零度的质疑。当对他人不是简单的欢迎的时候，你就会邀请他们对自己提出质疑，并将提问和对话的文化带入到问题中，成为所有的参与者要考虑的问题。这种往复的询问产生了一种无尽的清醒，为“共同生活”提供了唯一条件。因此身份认同，可以让我们走向拥有多元身份和掌握多种语言的新欧洲公民。

二、多样性和它的语言

“多样性是我的座右铭”，让·德·拉·封丹在他的《鳗鱼派》中写道。^①欧洲是个政治实体，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有多少个国家，就有多少种语言。这多种语言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与国民性一道，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此外，它必须对交换、混合和移植开放。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新事物。

大屠杀的恐怖后，19世纪的资产阶级以及20世纪的反叛者们开始面对一个新的时代。现在，欧洲的语言多样性正在创造着形形色色的个体，他们足以挑战全球英语的双语性。这可能吗？一切都证明并非如此。然而，一种新的族群正在慢慢兴起：一种复调主体和多民族、会多语种的公民。未来的欧洲会是一个能讲三语、四语甚至多语的，本质上为多元精神的单一主体吗？或者他们都被限缩至只能说全球语？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甚，欧洲的双语空间召唤着法国人去掌握多种语言，去探索世界的多样性，去把他们的奇特性带入到对欧洲和世界的理解中。我对法语所说的，同样适用于欧洲另外二十八种语言。对每一种语言而言（保加利亚语、瑞典语、丹麦语、葡萄牙语等等），正是通过这种对其他语言的入侵，其自身才得以迸发新的激情。这种激情看起来不会像流星，不会像怀旧的民间传说或学术界的遗迹，然而，它将作为复兴多样性的指标发挥着作用。

^①J. Kristeva, “*Diversité c’ est ma devise*” (*Diversity is my motto*) in *Pulsions du temps*, Fayard, 2013, p. 601.

三、走出民族萧条^①

无论持久与否，国民性都会经历真正的低潮，就像个人一样。欧洲正在失去它作为世界一极的形象，金融、政治和存在的危机显而易见。这也在许多欧洲国家出现，其中包括法国和意大利，他们都是拥有最杰出历史的国家之一。

当一个心理分析师给一位沮丧的病人诊治时，他从增强病人的自信入手。这样，在治愈过程中，两位主角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口头对话变得多了起来，从而对能够对所遭受的痛苦进行批判性分析。同样地，一个经历了萧条的国家，比如在开始产业扩张或进一步对移民开放之前，需要一个最佳的自我形象。“国家，和人一样，死于不知不觉的无礼”，季洛杜这样写道。人们对普遍主义和殖民内疚感的浅薄理解，使得政客和空想家们在世界大同主义的伪装下，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无礼。他们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国家。他们加剧了国家的萧条，然后给国家注入一种疯狂的兴奋，包括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

欧洲大陆上的国家正在等待欧洲的出现，欧洲需要自豪感和有价值的民族文化，为世界提供文化多样性。这种文化多样性是我们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对平庸邪恶的唯一解毒剂，平庸是恶的新版本。因此，联邦欧洲在寻找全球多极平衡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四、两种自由的概念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清楚地界定了欧洲文化与北美文化之间的差异。这是民主国家对自由概念有两种理解的问题。不同但互补，这两个关于自由理解的不同版本，同时存在于欧洲和北美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原则中。

让我用“自我开始”的方式来概括这两种自由的形式，康德为一种具有进取心的主体性的辩护，服从于理性的自由（纯粹的或实际的）和一个原因（神圣的或道德的）。在这种被新教所推崇的思想秩序中，自由是为了使自己适应因果关系的逻辑，或者引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是为了适应或“计算出生产、科学或经济的逻辑后果”而出现。获得自由就是有机会从因果中获益，以适应市场和利润。

但也存在着另一种自由模式，同样源于欧洲。它出现在古希腊世界，是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和苏格拉底的对话下发展起来的。与从属于某一原因不同，这种基本的自由在言说者身上展开，他们把自己展示给他人的同时，也展示给他们。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这种存在性的自由，通过自我与他者的不期而遇，在自由被原因和效果这一关系束缚之前，把自由

^①J. Kristeva, “Existe-t-il une culture européenne?” (“Does a European Culture Exist?”) and “Le message culturel français” (“The French Cultural Message”), in *Pulsions du temps*, Fayard, 2013, p. 601 and p. 635.

刻画成了一个关于我的无限的问题。诗歌，欲望和反抗是它的特权经验，揭示了每个个体之间无法比较的（尽管可以分享的）奇点。

人们可以看到第二种模式由于其质疑的态度而生的风险：忽视经济现实，孤立组合主义者的要求，限制宽容，不敢去质疑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新参与者的诉求，回归到陈旧的行为和懒惰而与全球化竞争的要求背道而驰。欧洲文化使用这第二种模式，我们也可发现其优点，但它以人类生活可共享的奇点草草收尾。

在这方面，欧洲远远没有达到同质化和团结一致。首先，“旧欧洲”是“新欧洲”^①经济和存在困难的严重问题。但也有必要认识到文化差异，尤其是宗教差异，这些差异正在从内部撕裂欧洲国家，并将它们分割开来。我们迫切需要学会尊重分歧（例如：东正教和欧洲的穆斯林，巴尔干地区的持续不安，以及希腊在金融危机期间的伤痛）。

五、信仰的需要，求知的渴望

在当前危机的多重原因中，有一个是政治家所忽视的，那就是否认我所说的与话语主体有关的前宗教、前政治的“信仰的需要”，比如我们自己，它把自己表现为一种“理想病”，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无论是本地还是源自移民）。

与那些好奇的、好玩的、寻求快乐的，想知道他来自哪里孩子相反，与其把青少年称为研究者，不如称之为信徒。他们需要通过相信理想信念来超越和离开父母，并超越他们自己。（我把青少年称为一个捣乱、浪漫、革命、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第三世界的捍卫者）。但是，失望却把这种疾病的理想推至破坏和自我毁灭，通过提高：一方面是滥用药物，厌食，破坏和过激的性行为，另一方面是原教旨主义的教条。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以绝对天堂的形式，以空虚的醉酒和殉难的形式，携手共同影响青少年，这种青少年在一些最脆弱的环境中可能爆发。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涉黑交通和在叙利亚和南非不断高涨的伊斯兰圣战的狂妄举动，就是这种情况目前的形式。

如果一种“理想病”正在震撼我们的青年和世界，那么欧洲有可能提供补救的方法吗？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主动请缨？在这种无情的全球化移民的背景下，面对非社会化，分裂的青少年所抱有的这种自相矛盾、虚无主义的信念，任何对这种不安全、痛苦和反抗的宗教疗法都是无效的。这个被拒绝的、愤世嫉俗的狂热者也可以从内部威胁我们。这就是我们对茉莉花革命的印象，这场革命由青年人追求自由，追求对自由尊严的认同而起，但狂热者需要相信的另一点就是消灭扼杀。

欧洲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是否能够应对宗教上不可阻挡的信仰危机？混乱的虚无主义——狂热主义叫嚣着，妨碍我们的思考，防止我们的联合，在世界各地生根，触及人类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纽带。建立于希腊——犹太——基督教的十字路口，移植着伊斯兰思想，既独立又可分享，这是这种人类的思想观念，看起来威胁重重。在这些决定性的时刻，瘫痪的欧洲在这些赌注之前表达了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调动我们的一切手段——司法的、经济的、教育的、

^①根据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在伊拉克战争的外交对抗中使用的有争议的标志。

医疗的——与一个微调的耳朵作和与必要训练作斗争？让青少年（和其他人）清醒的理想疾病在欧洲为何表达如此戏剧性？

在基督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十字路口，欧洲被要求在三种一神论之间建立路径——从会议和相互的解释开始，但同时也要在人类科学的启发下进行阐释和转换。此外，一个世俗主义的堡垒已经存在有两个世纪，欧洲是阐明相信的需要的最佳之所。启蒙运动在打击蒙昧主义的过程中，低估了它的力量。

六、再造的精神分析

我们该如何面对欧洲人文主义的缺陷——或是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新的挑战？因神学大陆的拆解而诞生的人文学科，对造成文明的不适有了新的认识；它们也提供帮助的方法。请允许我回顾 SoLenn 之家——青年之家（巴黎的科钦医院）的发展过程。

适度地，一步一个脚印，心理学正在这个新的语境下重塑自己。

我的个人经历使我特别适应跨学科的视角，使我能够将我的智力经验与今天占有我们的这种超连贯记忆的历史症状联系起来。自 80 年代末以来，我就目睹了对青少年进行分析心理治疗，并对青少年的具体结构感兴趣，这种青少年结构延续到了成年期：他的“理想病”，他需要信仰和渴望求知。我加深了对宗教历史和启蒙运动哲学的认识，也调查了宗教大陆的解构，幻想和破坏自由的弊端。我这样做，同时牢记这个“切断传统的线索”（托克维尔和阿伦特的观点）所固有的潜能，发生在希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和其他地方。弗洛伊德教导我们要跨越这个重大、独特的事件的上游，以便分析它无意识的驱动力和陷阱：无止境的“幻想的未来”，对我们价值观的无穷无尽的转化。在 911 之前，我对流氓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伊斯兰教的主张和斩首事件感到震惊。我在卢浮宫博物馆（1998）举办了一个以“斩首”为主题西方艺术的展览：代表——升华，美杜莎，大卫和歌利亚，朱迪思和霍洛费内斯，施洗者圣约翰，还有断头台绳... 我的研究在我的博士研讨会上继续进行，“信仰的需要”（巴黎第七大学）从五年前在青少年之家变成了理论和临床联合研讨会。我参加了聚集了哲学家、神学家、作家、艺术家，当然还有精神分析学家的跨学科论坛，让我相信新的人类学正在起作用，精神分析在这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不同，精神分析提供的不仅仅是解释，它实际上伴随着演员和创伤的受害者。

苏亚德因为严重的厌食症住院治疗：冷漠的激情、暴食症的症状和不断的呕吐。在我前面提到的“理想病”的过程中，自我解脱正在进行。在向激进化转变之前，她向她的家庭和世界宣布了缓慢自杀的声明，已经消除了时间。扯破的牛仔裤和一件超大套头衫已经在布卡（伊斯兰国家妇女穿的蒙面长袍，译者注）下面消失了。苏亚德静静地站了起来，但并没有断掉互联网，在那里，她与她不知名的同伙一起，用互通着愤怒的电子邮件，来反抗“叛教者，比不信的人更糟”的家人，并为“在那边”的旅程做准备，为了成为一夫多妻战士的情妇，功勋卓著的烈士母亲或威风凛凛的自我。

作为一个少言寡语的女孩，苏亚德像许多其他青少年一样，对心理治疗怀有疑虑和沉默，但她与其他十几名来自不同背景和拥有不同技能的男性和女性一样，进行了“分析多元文化心理治疗”的咨询，他们既没有被询问，也没有被诊断，也没有被相互判断。他们改进了他们团队的移情多样性：多元和传播的身份，重组的家庭，一个修复的社区。最大的接近与影响，感

觉和兴奋沮丧，羞辱，屈辱。精神治疗小组发现了一种语言，用来破解苏亚德的精神崩溃，并享受这种没有约束力的死亡(jouir a mort)。这位自称“科学头脑”的年轻女孩，在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都很有实力，但“在法语和哲学方面很整脚”，她开始喜欢讲故事，和她的团队一起玩，和别人一起笑。

我们再说回法语，用语言驯服苦难的驱动力和感觉，找到使它们存在的词语，重新制作和分享它们：语言、文学、诗歌、戏剧填补了缺乏意义和虚无主义的空白。罗兰·巴特说，如果你在一种语言的含义上找到了意义，那么“神圣的虚空就不再威胁了”。我还要说，如果我们在语言的丰富性中找到意义，神圣的原教旨主义就不再是威胁。在这点上，苏亚德还没有做到。她穿回了自己的牛仔裤。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但是有多少年轻女孩有像苏亚德那样得到认可、倾听和支持的机会呢？

七、关于女性权利的文化

从启蒙时代到女权主义者，在不忘记居里夫人，罗莎·卢森堡，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西蒙娜·韦尔等人的情况下，通过创造力和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斗争，妇女的解放为欧洲公民提供了一个民族、宗教和政治多样性的联邦竞技场。这种独特的欧洲文化特质，也是文化和妇女解放的灵感。最近，西蒙娜·德·波伏娃妇女自由奖颁给了年轻的巴基斯坦人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她因为在博客上支持年轻女性的受教育权，受到了来自塔利班的严重迫害。

让我以一般性的发言结束此文。对抗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怪物——经济上的政治封锁和生态破坏的威胁——欧洲文化空间可以提供大胆的回答。也许，这是唯一一种严肃对待人类处境复杂性的回答，包括历史的教训和自由的风险。

我太乐观了吗？我宁愿说我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悲观主义者。为了突出欧洲文化的性质、历史、困难和潜力，让我们设想一些具体的举措：例如，组织一个以“欧洲文化存在”为主题的欧洲论坛，让来自28个国家的知名学者、艺术家和作家参与进来，这个论坛代表了一个语言、文化和宗教万花筒。这个想法是在这个复杂而又有问题的和弦中，对历史和当前发生的事件进行反思，并围绕欧盟独创性、脆弱性和优势，提出问题。这个论坛可能会促进一个学院或一个欧洲文化学院的诞生，甚至可能是一个欧洲文化联盟，这个文化联盟将成为一个政治联盟的先驱和前身。使用多种语言将成为这个梦想中的重要角色。

愿更多的像今晚这样的论坛能给你的行动和动力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许诺晗)

Re-Founding Europe Through Culture

Julia Kristeva

(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Abstract:

This paper is largely taken from a talk given by the author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Europe or Chaos” , at the Théâtre du Rond-point des Champs Elysées, on January 28th, 2013. Having highlighted some specific traits of European culture: the questioning of identity, the dialogue between languages, the meaning of nation, of freedom, of women, and of religion in secular society,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we analyse the current crisis in the European conscience by making the transvaluation of European cultures a major asset for the re-foundation of Europe.

Key Words:

European culture; identity; diversity; ideality illness